

中国

苏双碧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封建主义批判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
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
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
科学的口号，它的历史取向是
针对着封建专制主义来的。

『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整个过程，
都有强烈的封建专制主义烙印。

邓拓、吴晗、遇罗克，

三个都是在『文革』中

死于封建法西斯专政下的。



中国封建主义批判

苏双碧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中国封建主义批判

苏双碧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237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420

定价：12.80 元

书号：ISBN 7 - 216 - 02556 - 3/D·464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摘自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前 言

辛亥革命打倒了中国的皇帝制度，但是，皇帝制度赖以生存的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却不会因为皇帝制度的结束而立即告终。这是因为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以致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发生不久，政权便落到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手中。从历史的角度和政治的角度看，人们很自然要指责袁世凯是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并做了一个八十三天的皇帝梦。但是，这个不知民主为何物的袁世凯，却能从一个清王朝的内阁总理，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大总统，最后还是当了皇帝。这当中除了袁世凯自身的谋略之外，至少还有以下几点是值得后人思考的：一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老百姓还没有觉悟起来，还没有真正自觉地反对中国有个皇帝。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从封建制到共和制，其过程的复杂性认识也不清楚，他们以为皇帝被推翻，谁来当总统都必然是搞共和政体的。孙中山拱手让权，黄兴、胡汉民、汪精卫更积极主张让权。三是革命派内部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存在着复古倾向，辛亥革命爆发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便掀起一个复兴古学运动，在袁世凯的筹安会六人中，更有四人是同盟会成员，而杨度、严复也很靠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过往甚密。可知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四年后还能够登上皇帝宝座绝非偶然。

中国真正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在打倒孔家店的冲击下，封建专制主义和封

建的伦理、道德受到猛烈的冲击。五四运动期间封建主义确实是声名狼藉了。但五四运动之后,封建主义凭着它深厚的土壤,便重新变换面谱,继续阻碍中国历史的进程。在五四运动后,这种历史现象几乎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反复出现过,有的是当权派借助孔孟之道搞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有的则使权力和职位掺进封建的思想意识,本质上也是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十年动乱,名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搞全面专政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统治。面对这场浩劫,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他痛斥“四人帮”是用“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因而号召全党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以使广大干部“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所以,批判封建主义,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应当把它当作跨世纪的战略任务来抓,直到我国的经济相当发达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相当健全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才能逐步消除。

本书是我近年来对中国封建主义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一些研究和评析的成果,共收入有关文章二十五篇,分六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想说明批判封建主义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长期性;第二部分主要是谈传统文化,是想区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第三部分是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组文章,本意在于弘扬民主与科学;第四部分主要谈爱国主义,目的是想分清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内涵;第五部分历史人物评价,选择李贽、洪承畴、施琅,都和批判封建的传统观念有关;最后一个部分,即第六部分是谈文化大革命的,除第一篇从总体上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外,其他三篇分别写了邓拓、吴晗、遇罗克,三个都是在“文革”中死于封建法西斯专政下的。十年动乱之后,我分别写了为吴晗、为遇罗克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又写了《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是最早为邓拓平反的文章之一。收入本集子的这三篇文章都是近作,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封

建专制主义的凶残面目,使读者增加一些感性知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本书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第一部分中的《中国文字狱述论》一文,作者是求是杂志社的罗素英同志,在本集成书过程中,我很想写一篇有关封建社会文字狱的文章,但时间已来不及。恰好知道罗素英同志在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征得她的同意将该文收入本书,以增成色,在此特向她表示感谢。另外,湖北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致以深切的敬意。

一九九九年三月于北京沙滩

目 录

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的战略任务	1
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	9
封建主义和中国近代化	31

中国文字狱述论	48
关于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种倾向	68
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其他	86
关于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	105
传统文化四议	116
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120
关于两次“文化热”	125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	128

论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

——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而写	141
五四运动和传统文化	151
正确理解五四精神	159

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	162
爱国 卖国 误国	
——再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	170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175
李贽思想新探	184
李贽和思想解放	201
从宏观角度评价洪承畴	209
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将领施琅	218
是以史为鉴,还是搞封建专制主义	226
围绕着批吴性质的上层争论	244
巨星陨落在序幕中	264
遇罗克冤案平反始末	280

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的战略任务

就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风雷激荡的世纪，是飞速变化的世纪。一九〇一年，历史走进本世纪时，中国还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如果从秦汉算起，这种封建王朝的统治形式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任凭陈胜、吴广，任凭李自成、洪秀全们怎样冲击，封建王朝的统治仍旧牢固地存在着。但是，进入本世纪的第十一个年头，辛亥革命的炮声就把清王朝轰垮了。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成败，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毕竟结束了。在这之后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谁想恢复封建王朝的统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辛亥革命毕竟使新的社会形态替代了旧的社会形态。历史仅又过了六年，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而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把中国进一步推上了多极政治争斗的局面，历史在斗争中激变，历史在斗争中前进。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激变中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战胜了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又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特别是本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当人们从“文革”的惨痛教训中猛醒过来时，几乎没有作过多的思索和选择，便纷纷站在由邓小平举起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年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是过去任何辉煌的时代也无法比拟的。本世纪值得欣慰值得回顾的事很多，然而，在本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也很多。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封建主义的影响。虽经仁人志士不遗余力地反对过一个多世纪，封建主义却仍然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时刻在阻碍着中国历

史的进程。

中国的封建主义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因而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显得更为牢固。封建主义受到冲击,始于上个世纪中叶的西学东渐。尽管当时改革派不过是提出“师夷长技”,学点船坚炮利;提出开办同文馆,学点外国语和天文历算;提倡富国强兵,学办近代工业;后来也有胆子大点的,提出君主立宪,提出改变祖宗之法。但是,封建保守派,几乎在历史每前进一步的时候,都要激烈地反对,其武器要么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要么是西学的传播“有伤王化”,要么是封建纲纪,或者提倡复兴国学、发扬国粹。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孙中山、章太炎,从陈独秀、胡适到李大钊、毛泽东,以及胡耀邦、邓小平等等,都身体力行,极力主张批判封建主义。而封建卫道者,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用来反击或批判的武器,仍然是上个世纪抵制西学东渐的那些祖宗之法、封建纲纪或提倡“国粹”。这些武器不用更新,原封不动就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大军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或者重新宣扬封建主义。他们步步为营,阻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发展。

确实,不能小看封建主义这个痼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初年,正当资产阶级革命蓬蓬勃勃向前发展之时,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这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个标志,但就在这时候,资产阶级的头号理论家章太炎等半路杀出,他们提出“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其目的是为反对“醉心欧化的人”。其实,用“国粹”反对西学的传播历来是保守派的一种借口。况且,在二十世纪初年,并不存在着“醉心欧化”的思潮,而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广大知识界对腐败的清王朝失去信心,把眼界转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欧和日本,向这些国家探求真理,寻找中国的出路。这种历史现象触动以旧学安身立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借机大反西学传播,杜撰一个所谓

“醉心欧化”的思潮，用孔学、国粹来加以反对。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有力地驳斥。尽管梁启超本人也跟着他的老师康有为当了一段保皇派，但他对当时的社会思潮的认识却基本上是清楚的。一九〇二年四月，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就尖锐地指出：“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之，是北行南辕也。”他主张“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地尽量输入”。此后，梁启超向中国介绍了许多西方杰出的思想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中国读者。梁启超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醉心欧化”的人。但就在这期间，在反对“醉心欧化”，在提倡国粹、复兴国学的声浪中，戊戌变法的旗手康有为堕落成为顽固的保皇派，维新运动的头号启蒙思想家严复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成员，而辛亥革命的头号资产阶级理论家章太炎则在推进国粹思潮中步步后退，终于在复兴古学的声浪中成为褪了色的人物。三个杰出人物在封建主义的泥污中蜕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五四运动之前的一九一五年，之所以有必要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当然不是偶然之举。辛亥革命期间或前后，由于一大批资产阶级理论家，着力于复兴古学、宣传国粹，资产阶级的思潮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却仍然被排除在中国的社会之外。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在广大城市、农村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封建主义思想控制着。正因为封建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也只有借助孔子之亡灵，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尚孔孟，以端其基，以致其用”，提倡尊孔读经，继续用孔孟之道来荼毒生民。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喊出了震撼国民心灵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矛头都是对着封建主义思想、封建迷信和封建道德的，是对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讨伐。严格说来，也就是自五四运动起，中国广大下层社会的思想才受到一次触动，才意识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仁义

道德为表，以“吃人”社会为里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吃人血馒头的人才有可能醒悟起来，而阿 Q 也才会有小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的思想，尽管迂腐，但毕竟和过去有点不同了。

对五四运动产生的两种极端的倾向，几十年来，人们却似乎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一叫做“全盘西化”，这在五四运动中明确主张的并不多，胡适、陈序经后来鼓吹过“全盘西化”，但那是在一九二六年之后到三十年代初的事。因为所谓“全盘西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生活习俗，传统的风气，这些东西怎么能都西化？这个概念就连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事实上，不论胡适还是陈序经，他们研究的仍然是传统文化，“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推开。它之所以遭到反复批判，是因为他们以一个极端来反对另一个极端。由于这个论调有明显的错误，伤及正统的中国人的自尊心，谁都可以不太费力气地批它几句。至于“全盘西化”究竟有多少影响和危害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地研究过。其二是国粹思潮，即封建的卫道思潮。他们视五四新文化思潮如洪水猛兽，声嘶力竭地反对科学和民主，而对刺痛其筋骨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创办《国故月刊》，组织“亚洲古学会”，攻击新思潮是“人间之怪物”，是“背天反常禽兽”，叫嚷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但是，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新闻界都纷纷抨击封建卫道者，认为这场争论的“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诸君”。鲁迅在《随感录》中也辛辣地指出，所谓保护“国粹”，是保护生在中国人肢体上的“无名肿毒”，而这种“肿毒”实际上是“祖传老病”，是封建糟粕，并不吃香。他们只是凭着旧文化的深厚土壤拼命阻止新思潮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如他们所愿退回到封建专制的时代去。但是，国粹派的卫道者们，尽管是“拼了老命”了，还是遏制不住新思想的发展，反而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失败了。实际上这个派别并没真正失败。由于他们有着深厚

的思想土壤和文化土壤,五四过后不久,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历史进程遭到暂时挫折之机,辜鸿铭等便又重新举起国粹的旗号,叫嚷要“复兴东方文明”,即复兴孔孟之道,说什么欧洲人不行了,“应该接受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应该欢迎我们中国的孔孟之道”。其时,人们对五四的科学、民主赞誉之声犹在,这个反五四精神的复古逆流,自然受到社会广泛的冷淡和抵制。但是,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又深又厚,有着相当大的历史承袭性,只要稍微有点土壤和气候,便可以变换面孔,重新复活。继辜鸿铭等的吵嚷之后,一些国民党的政要,如戴季陶辈就认为中国能立国于世界,“焕然文明者,厥为礼教”,“礼乐之制,为建国要务”。在五四运动之后,戴季陶一类的国民党右翼,包括军阀势力,以及蒋介石等等,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化主张,大多借用传统文化中的精辟词句,如忠、孝、仁、义、礼、信等等。这些熟悉的词句,隐含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惰性,可以起到遮住人们的视线,混淆是非界限,从而起到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国粹派或者叫做尊孔读经派,在近代中国反复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和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改造,以及在城市的市场建制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等等活动,对封建主义的打击是空前的也是沉重的。但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滞留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和权力掺杂在一起时,它的消极作用便尤其突出。封建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的统治特点,是以皇权为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其表现形式是朕即国家,朕即社稷。皇帝讲话是金科玉律,只要是皇帝说的话,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上下臣民一概要服从。维护这种独尊信念的是对皇权的愚忠。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本应来自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专制和忠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果沾上封建主义思

想，皇权在他们身上同样会有突出的表现。十年浩劫初期，毛泽东想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赞成的人并不多，就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把吴晗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江青、张春桥等人，以上海为基地，以《文汇报》为喉舌，步步上纲，步步扩大，矛头直指整个上层建筑以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时，全党和整个党中央赞成发动这场大革命的还是不多。站在姚文元一边的也只有张春桥、江青，以及当时在北京的康生几个人。而在党中央所在地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中央政要，并没有同意，甚至在行动上对姚文元诬陷吴晗，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是有所抵制的，要说力量对比，反对派远远超过张春桥、江青等人。但是，关键在毛泽东，他站在少数派一边，少数派便立刻变成多数派，多数派便会立即全线崩溃，其首要人物便成为被诛伐的对象。人们都还记得，在“文革”中，十多位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在怀仁堂研究工作时，对当时形势发了几句牢骚，立即被扣上“二月逆流”，统统被列入批判的对象。在这里，是非的标准是权力，而不是真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人们走出现代迷信，开始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对我们现实生活仍然产生着重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邓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邓小平又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会出现家长制作风，出现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因此，邓小平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

响”，这“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样才能“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邓小平的号召下，曾经发表过一些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批判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同时，也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一有气候、土壤，便会重新萌发起来。近几年来封建主义重新变换面孔，卷土重来，继续阻止历史的进程。比如，他们打着鼓吹传统文化的旗号，把一些原是封建糟粕的东西，当成“国粹”加以宣扬，如二十四孝图、三纲五常、老皇历等到处传播和销售。在思想领域，有些人则宣传旧道德、旧礼教，传播封建迷信；有的人则提倡什么新儒学，说什么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等等，复古思潮旗帜鲜明，不一而足，不但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拉回到封建主义去，还想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成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即将告别二十世纪。回首本世纪的历史进程，封建主义就像一条又粗又黑的线，时刻在纠缠着历史的脚步，阻拦着历史的进程。正如邓小平在上引文章中所说的，由于我们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下大功夫去清除它的影响，它便成为在思想领域里留给下一世纪的一个巨大的消极因素。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如一些人所愿会退回到孔孟时代的，但是，封建残余势力对历史的反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讲述“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哪怕只有最简单的一句“最高指示”，都会把千百万人召唤到大街上去游行、喊口号，简直不可想象，但它却是事实。谁能保证，当人民赋予人民公仆的权力掺进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时，朕即国家的思想不会再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不会再次发生，家长制的作风不会再抬头？历史当然不会以原样重复，但历史由于封建主义的阻挡，进程会变得迟缓、停滞，甚至倒退，这却是可能出现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号召，十分重要。在邓小平的理论宝库中，当然也包括批判封建主义这一历史命题。只有认真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影响，坚决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对各个领域的侵蚀和影响，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也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阔步前进。